

学术前沿: 中国社会发展与转型

# 中国加盟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与 对外政策转型(1978—1986)

田 凯

(辽宁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36)

**摘 要:** 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ECC)是由政府、商界、学界共同派代表组成的准政府间组织。1986年,中国成功地加盟PECC使其升级为涵盖中日美三大国最初的亚太地区合作机制。而整个加盟过程与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展开紧密相关联,是中国对外政策转型的结果。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实行,中国与亚太地区各国关系(包括与台湾地区)发生了变化,这些双边关系的变容是导致中国加盟PECC的根本原因。中国加盟PECC是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表现的同时,也强化了中国的对外转型,为冷战后中国亚太地区战略的展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 PECC; 对外政策; 中国外交; 亚太地区主义; 奥林匹克方式; 独立自主对外政策

**中图分类号:** D8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283(2013)01-0018-06

**收稿日期:** 2012-09-13

**基金项目:** 辽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科研项目(LNUCEAS2012-CPE02)

**作者简介:** 田凯,男,辽宁沈阳市人,法学博士,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 导 论

冷战终结之后,中国为了提高国际地位,大力推动多边外交的发展。其中,地区主义外交成为多边外交的主要支柱之一。1991年,中国加盟了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简称APEC)。1997年,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15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强调“要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充分发挥我国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中的作用”。<sup>[1]39-42</sup>在这样的政策指引下,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应运而生。2001年以来,中国更是主导了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而且在亚太地区合作方面持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帮助中国外交攀上了“新高地”。<sup>①</sup>基于以上事实,学界把1990年代看做中国地区主义外交的转型期。<sup>②</sup>

然而,事实上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就已经认识到承担国际责任并参与互信合作的重要性了。<sup>③</sup>1980年,中国成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加盟国,并于1986年提出复归关税及

贸易总协定(GATT)的申请,而且加入了亚洲开发银行。<sup>④</sup>同年,大陆与台湾地区一道成为APEC前

<sup>①</sup> 外交新高地是指,在现在和未来的一段时期,中国在全球政治与国际关系中不断上升的地位。参见王逸舟《中国外交新高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8页。

<sup>②</sup> 肖欢容《地区主义:理论的历史演进》,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31—246页;Yong Deng. *China's Struggle for Status: The Realign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200.

<sup>③</sup> 到21世纪初,中国共参加了273个国际组织,这其中239个条约是改革开放以后缔结的。参见Ann Kent. *Beyond Compliance: Chin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Global Secur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60—64.

<sup>④</sup> 本文的亚太地区合作组织是指由亚太地区国家参加的旨在促进地区经济、文化等合作的地区性组织。亚洲开发银行成立于1966年的亚太地区政府间金融开发机构。其67个成员国中的19个国家来自北美和欧洲,因此不能算作纯粹的亚太地区合作组织。

身的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nference,简称PECC)的成员国。<sup>①</sup>从以上外交过程来看,在1980年代,中国就已然开始通过参与多边合作来摸索对外政策的转型之道了。当然,这与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实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尽管在1982年,中国政府就正式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但是这一政策的执行经历了长达7年(1978—1985)的调整期。<sup>[2]38-51</sup>在这段时间里,对外政策转型从各种维度表现出来。其中,加盟PECC是独立自主对外政策转型的功效体现。中国超越意识形态参加到亚太地区合作中,使PECC扩大成为涵盖亚洲冷战两大对立国家中美的最初的地地区合作机制,促进了整个地区的安定。并且,大陆与台湾地区共同参加的形式(奥林匹克方式)被APEC沿用,影响到APEC的构成。

关于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已经有大量研究。这些研究或是与邓小平的外交思想相关联,或是与反苏战略、改革开放相结合,<sup>②</sup>虽然说明了政策形成的思想源流和动因,却没有分析政策产生的效果。此外,1980年代中国多边外交的研究,更多地聚焦于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sup>③</sup>而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参与地区合作的研究则少之又少。虽然曾任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会长的杨成绪撰文介绍了PECC使中国融入太平洋经济圈的简史;<sup>[3]11-18</sup>伍兹分析了在中国加盟PECC过程中“认识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y)”的功能,特别强调了PECC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埃里克·特里格(Eric Trigg)的作用;<sup>[4]129-136</sup>千叶把焦点集中在同时代的中国学者的研究,梳理了当时中国学者的认识,试图反映中国政府的态度变化;<sup>[5]</sup>高木则认为,中国为了对抗苏联,才在1986年加快了参加PECC的进程。<sup>④</sup>可是,这些研究没有解释中国到底缘何加盟PECC,在加盟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与中国的对外政策转型有怎样的关联,又对中国的政治外交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为此,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加盟PECC进程的深入剖析,回答这些问题。

## 一、“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中的中国定位

PECC是由政府、商界和学界共同组成的准政府间组织(quasi-government institution),<sup>[6]8-10</sup>其根源是1978年,当选为日本首相的大平正芳,提出的“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政策。这一政策涵盖了经济、社会与文化领域,旨在强化亚太国家间的合作关系。大平正芳为此成立了环太平洋连带研究小组,任命常年推进亚太地区合作的经济学家大来佐武郎为组长,讨论构想的具体内容并制定了发展方案。1980年,大平正芳访问澳大利亚,与马尔科姆·弗雷泽总理达成共识,联手推动“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实现。1980年9月,在日澳共同提案的第一次太平洋共同体研讨会(堪培拉研讨会)在堪培拉召开。1982年,在曼谷举行的第二次研讨会上,会议被正

式定名为PECC。

“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特别提出了“开放的地区”的理念,即它绝不是一个排他的封闭的地区主义构想。<sup>[7]17-24</sup>1970年代,随着与西方阵营敌对状态的消除,中国正逐步向“自由主义”国家集团靠拢。在此背景下,大平正芳把中国作为“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对象也是情理之中的。但中国毕竟是刚刚走出“文革”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路线的未来也不明朗,并且,当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对亚太地区经济没有太大影响,所以,研究小组一直把中国视为一个“未来型课题”来处理。<sup>[8]2</sup>他们认为,中国的未知因素很多,应作为例外来处理。现阶段仍以市场经

① 1992年,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更名为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② 黄文辅《论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外交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朱昕昌,宋德星《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新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2期;赵振英《邓小平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思想探析》,《学习与探索》2000年第3期;小島朋之《中国政治・社会的變動と国際關係 独立自主外交について》,國際政治(通号78),1984(10);益尾知佐子《中国政治外交の轉換点:改革開放と独立自主の对外政策》,東京大学出版会2010;Harry Hardings. *China's Changing Role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d. ed.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80'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77—223; Robert Ross. *Succession Politics and Post Mao Foreign Policy*. June Teufel Dreyer ed. *Chinese Defense and Foreign Policy*. Professors World Peace Academy, 1989, pp. 27—62。

③ Gerald Cha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on in Non -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Since 197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Harold Kagan, Jacobson & Michel Oksenberg.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MF, the World Bank, and GATT: Toward a Global Economic Orde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0; Elizabeth Economy & Michel Oksenberg ed. *China Joins the world: Progres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Alastair Iain Johnston & Robert S. Ross ed.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Routledge, 1999; Alastair Iain Johnston.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④ 推行独立自主对外政策之后,“反苏”在中国对外政策中的战略地位不断下降。因此,很难单纯地把对抗苏联作为中国加盟PECC的主要动机。事实上,1979年中苏就开始了关系正常化的相关谈判。参见高木誠一郎. *中国と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の多国間協力*. 田中恭子(编). *現代中国の構造變動(8) 国際關係: アジア太平洋の地域秩序*. 東京大学出版会, 2001年版,第73—94页;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78—79页,第405—421页。

济国家为主要讨论对象。<sup>①</sup>

与此相对照,中国政府却明显表示出对亚太地区合作的关注。1979年3月,中国驻澳使馆派代表参加了在堪培拉召开的太平洋地区贸易与发展会议(PAFTAD),中国驻美使馆派代表列席了1979年5月在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召开的研讨会。到1979年10月,中国驻东京大使馆先后两次询问了环太平洋连带研究小组的进展情况。<sup>②</sup>1980年9月,中方代表应邀参加了堪培拉研讨会。<sup>[4]130</sup>关于堪培拉研讨会,中国外交部美洲和大洋洲司司长韩叙指出,不希望环太平洋地区经济合作忽视中国的存在。<sup>③</sup>

此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越来越大。从1977年到1985年,中国的进口以年均25%、出口以年均近20%的速度增长。<sup>[9]</sup>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加盟问题逐渐成为PECC成员国讨论的重点。1985年,特里格提出在PECC温哥华会议上解决中国加盟问题的建议。最终,在1986年,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一起成为PECC的成员国。

## 二、中国国内对亚太地区合作态度的转变

在“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提出之后,中国学界很快显示出对这一课题的强烈关注。1979年,刘万镇撰文指出,日本与欧美的贸易摩擦是日方提倡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动因。<sup>[10]</sup>1980年,陈锋指出,苏联威胁和国际政治形势的不安定会阻碍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发展。<sup>[11]</sup>此外,在同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对环太平洋连带构想背景、内容及经济原因进行分析的文章。<sup>④</sup>在1982年4月澳大利亚举办的研讨会上,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宦乡强调,亚太地区合作发展潜力巨大,不应排除中国的参与。<sup>[12]342</sup>早期的论述大部分相对客观,分析日本的动机和亚太各国反应的研究占了主要部分。

1984年,邓小平视察了经济特区,新批准了上海、大连等14个沿海开放城市。在此背景下,把中国的现代化与亚太经济相结合成为1984年以后关于亚太地区合作学术研究的一大特色。例如,罗元铮论述了太平洋地区各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外资<sup>[13]</sup>。王日痒指出,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作为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sup>[14]153-157</sup>章粟强调,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亚太经济合作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和对外开放创造良好国际环境的同时,还给予了中国更多的发展机会。因此应该着手准备参加亚太地区合作。<sup>[15]4-7</sup>学者们的观点既是政府态度发生变化的一种反应,同时也会对政府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

同时,中国政府开始把改革开放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相联系,并积极地参与到亚太经济合作的讨

论中。1984年1月29日,在中国未来研究会学术座谈会的讲话中,董大林(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强调,应该将中国的现代化与亚太经济发展相结合。<sup>[16]11-12</sup>1984年9月25日,宦乡在上海的研讨会中指出,太平洋经济合作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sup>[17]118-119</sup>12月,宦乡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太平洋地区的发展前景与中国的现代化”研讨会,<sup>[18]64-65</sup>在会上他强调,中国应该作为第三世界代表积极地参与到亚太地区合作中。<sup>[14]1-8</sup>宦乡作为国务院对外政策研究专家,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决策能够产生直接影响,因此他的积极姿态对中国参与亚太地区合作是关键。<sup>⑤</sup>1985年6月,赵紫阳为在北京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国际贸易博览会”送去了祝辞。<sup>[19]</sup>1986年11月,亚洲太平洋发展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走向2000年的亚洲太平洋经济北京会议”,来自日本、东盟等15国和1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与会。赵紫阳在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中国政府将在坚持相互尊重、强化交流、平等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的基础上,积极的推进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sup>[20]620</sup>1986年11月,在PECC温哥华会议上,中国加盟了PECC,宦乡作为代表团团长参加了会议。

① 環太平洋構想について(根据日本情报公开法申请解密资料)。日本外务省,1979-7-18。

② 調査部参事官. 環太平洋連帶問題(根据日本情报法公开申请解密资料)。日本外务省,1979-10-6。

③ 太平洋協力セミナー(中国側の態度):第2288号中国発外務省着電報(根据日本情报公开法申请解密资料)。日本外务省,1980-9-25。

④ 刘甦朝《日本的“太平洋共同体构想”》,《国际政治研究》1982年第3期;张碧清《太平洋共同体的设想及其前景》,《世界知识》1983年第8期;裴默农《日本—东盟的“特殊关系”与日本的“太平洋圈”发展战略》,《国际问题研究》1982年第4期;郭焯烈《对日本“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初步分析》,《国际展望》1982年第42期;高中路《关于日本的“环太平洋连带构想”问题》,《日本学论坛》1981年第2期;陈乔之《论东盟国家对“环太平洋联合构想”的态度及其原因》,《东南亚研究》1982年第4期。

⑤ 新中国成立之后,宦乡历任外交部欧非司司长、中国首任驻英代办、外交部部长助理兼政策研究室主任。1976年从“文革”迫害恢复工作后,出任比利时大使兼驻卢森堡大使及驻欧共体使团团长。1978年回国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央国际问题写作小组副组长,1982年起任国务院国家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宦乡常年活跃在外交战线并在退休后仍然在中央的对外政策制定中保持着很强的发言权。如本文后面介绍的那样,宦乡参与了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制定并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系统地阐释了政策的内涵,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外政策转型的关键人物。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宦乡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1987年,宦乡成为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第一任会长。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对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发展的态度是在1984年到1986年之间发生变化的。在这一时期,中国逐渐将目光投向了亚太地区合作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关系,加快了参与PECC的进程。

### 三、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提出

1978年,以邓小平为首的经济改革派成为主力,然而经济路线的对应依然存在。在此背景下,1984年1月,邓小平视察了经济特区,并新指定14个沿海开放城市。1985年第一家合资公司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立。1986年,中国开始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并成为亚洲开发银行的成员。同一时期,沿海城市也加大了吸引外资的力度,这进一步的扩大了地方的自主性。中国参加亚太经济合作为改革派注入了更大的力量。

在外交方面,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反霸权外交。对越反击战成为反霸权外交高潮的同时,也是中国转向独立自主外交的分界点。此后,中国政府开始大规模修正反苏外交路线。担当这个任务的是胡乔木、宦乡以及李一氓统帅的中联部。<sup>[21]</sup>

198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胡耀邦在政治报告中表明了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的立场。宦乡在10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上撰文,诠释了“独立自主”的具体内容,并提出了三个基本原则:第一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树立并发展同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的关系;第二是强化与第三世界国家及其他友好国家的团结合作;第三是反霸权、拥护世界和平。以上原则的提出,意味着中国事实上停止了支援第三世界非共产主义的行为。中国认为,和平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改革开放政策,而独立自主对外政策会对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起到促进作用。如前所述,独立自主对外政策转型是在1978年到1985年之间实现的。这一时段与从“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提出到中国加入PECC的时段相重叠,而在中国参加亚太地区合作中起主导作用的宦乡也是独立自主对外政策形成的核心人物。因此,可以说中国加盟PECC与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紧密相关。

在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旗帜下,中国政府开始积极推进双边首脑外交的展开。1984年1月,赵紫阳访美,促进了中美相互理解,为中美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sup>[20]</sup>4月26日到5月1日,里根总统回访中国。领导人的互访把中美关系推向新的高潮。同一时期,中日关系也进入了“2000年交往史中的最佳状态”。1983年,胡耀邦访日,确认了中日关系四原则。1984年3月,日本中曾根康弘首相访问中国,提出从1984年到1989年为中国提供4700亿日元贷款的构想。<sup>[22]</sup><sup>132-133</sup>1984年2月和1985年5月,

澳大利亚首相鲍勃·霍克两次造访中国。1985年4月,胡耀邦回访澳大利亚,强化了两国的友好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日、美、澳等亚太发达国家开始积极推进中国加入亚太地区合作之中。

### 四、改善与东盟的关系

改善与东盟各国的关系对于中国参与亚太地区合作具有决定性意义。东盟各国最初对中国的加盟充满疑虑。1983年11月,在巴厘岛召开的PECC会议中,东盟国家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坚决反对中国加入<sup>[5]</sup>。中国曾经对东南亚共产党的援助所带来的恐惧是他们反对中国加盟PECC的原因之一,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担心中国会与他们争夺来自日、美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sup>[23]</sup>事实上,日澳共同推动的“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行动也遭遇了东盟的冷遇。在1984年召开的东盟外长扩大会议上,一直对PECC持有怀疑态度的东盟各国终于表现出积极姿态,这才使亚太地区合作看到了新的希望。

从1970年代开始,东盟各国与中国的关系逐渐好转。中国分别与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1978年11月,邓小平出访泰国,并与泰国签署了贸易协定。<sup>[24]</sup>271-274 1984年1月1日,中国在文莱独立之后立刻予以承认。1月,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访问北京,就加强经贸、科技及文化领域的合作与中国领导人交换了意见。2月,外交部长吴学谦访问马来西亚,1985年11月马哈蒂尔总理回访中国。新加坡虽然直到1990年末与中国恢复邦交,但是李光耀于1975年、1980年以及1985年三次访问中国,邓小平与赵紫阳也分别于1978年和1981年出访了新加坡。1981年中、新互设商务代表处,1985年两国实现通航。

随着中国与东盟各国关系的改善,需要解决的问题只剩下与东盟“超级大国”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了。早在1950年,印度尼西亚就与中国建立了邦交关系。到1960年代中期,苏加诺统治时期的印度尼西亚在激进民族主义掩护下急速“左”倾化,最终退出联合国,与中国确立了被称为“北京=雅加达轴心”的同盟关系。<sup>[25]</sup> i-ii 可是1965年,经屠杀共产党的“9·30事件”上台的苏哈托开始仇视中国,1967年10月30日两国断交。直到1982年中国宣布独立自主对外政策,中印关系才看到了希望的曙光。1985年4月,外交部长吴学谦参加万隆召开的30周年纪念日大会。这是中印断交以来出访印度尼西亚的第一个中方高级代表团。吴学谦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向印度尼西亚传达了改善两国关系的立场,他指出,中国政府愿意与印度尼西亚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并希望在经济及科技文化领域开展平等的互惠合作。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与两国人民利益一致,有利于东南亚及亚洲整体的和平与稳定。<sup>[26]</sup>对此,苏哈托也在会谈中对中方改善关系意愿做了积极回应,他指出,应基于“万隆精神”和“和平共处

五项基本原则”发展两国关系。同年7月,印度尼西亚工商会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在新加坡签署了贸易谅解备忘录,恢复了中断18年的中印直接贸易关系。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关系的改善成为中国加盟 PECC 的关键。1985年,当中国加入 PECC 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时,印度尼西亚的 PECC 代表瓦南迪强调,原则上不反对中国参加 PECC,但是中国的即刻加盟可能会给修复印度尼西亚与中国关系的努力添加障碍,中国加盟问题应延迟至1986年的温哥华会议以后讨论。1986年6月,加拿大外交部长拉克与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库苏马-阿特马贾举行会谈,并取得了印度尼西亚方面的让步。<sup>[4]134</sup>在随后11月召开的温哥华会议上,中国顺利成为 PECC 成员国。

## 五、台湾地区加盟 PECC 问题的解决

在中国加盟 PECC 过程中台湾地区的参加成为难题。台湾地区很早就表现出对亚太地区合作的关注,并派观察员参加了1982年的曼谷会议和1983年的巴厘岛会议,而且正式提出了加盟申请。1985年,特里格提出采用“奥林匹克方式”来解决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加盟问题。他分别与台湾的辜振甫和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余湛进行会晤。<sup>[27]</sup>1986年,在 PECC 温哥华会议上,中国大陆最终与台湾地区以“奥林匹克方式”加盟 PECC。1991年,中国加盟 APEC 之际,也沿用了“奥林匹克方式”。

“奥林匹克方式”的实现与两岸关系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随着1979年中美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中美关系进入了历史上最为安定的时期。之后,美国制定的“台湾关联法案”,使台湾地区意识到美台断交并不意味着自身的“灭亡”。<sup>[28]132</sup>进入1980年代,台湾地区逐渐软化了对大陆的强硬姿态。从1982年开始,台湾地区不再称北京为“共匪”,而改称“中共当局”,同时放弃了“反攻大陆”的口号。<sup>[29]32</sup>在此基础上,蒋经国开始推行“实质外交(substantive diplomacy)”政策,强化了与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关系。在国际层面上,台湾地区开始寻求在国际组织中与大陆的共存政策,以“中华台北”的名称积极参加国际机构。<sup>[30]62-63</sup>

与此相呼应,1984年9月26日,中国与英国就香港回归祖国大陆问题最终达成共识,并发表了联合声明,再次言及大陆与台湾地区关系的缓和以及香港回归问题的解决,成为中国在加盟国际组织问题上对台湾地区“让步”的契机。

其中,加入亚洲开发银行是中国对台“让步”的很重要的例子。1983年2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亚洲开发银行,同时要求亚洲开发银行取消台湾地区的会籍。可是,美国坚决反对驱逐台湾地区的代表,并声称如果台湾退出,将重新考虑对亚洲开发银行的资金赞助问题。1984年1月,赵紫阳在访美之际

表达了“妥协”的意向。1985年11月26日,亚洲开发银行董事会决定以“中华台北”的名称保留台湾地区的地位。1986年3月10日,中国成为亚洲开发银行的新成员<sup>[31]231-234</sup>。台湾地区以“中华台北”的名称参加国际组织的形式被称为“奥林匹克方式”。1986年11月,在中国参加亚洲开发银行前例影响下,中国与台湾地区一起加盟了 PECC。

## 结 论

1978年以后,中国政府认识到创造和平环境对于改革开放政策顺利进行的必要性,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其结果是中国放弃了对东南亚共产党的支援,改善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同时积极参加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贸易、投资机制,以获取改革开放所需的资金与建议。通过参加国际组织巩固了改革派在中国国内的地位。<sup>[32]165</sup>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与世界银行、IMF 和亚洲开发银行相比 PECC 不能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加入的紧迫性明显降低。并且,作为地区组织的 PECC 在1982年才正式成立,直到1984年7月的东盟外长会议之前,东盟各国的态度十分的暧昧。尽管如此,中国还是担心在未来的亚太地区丧失“发言权”。<sup>[33]219</sup>从1984年起开始把亚太地区合作视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潜在力量,对加盟 PECC 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此后,以加拿大人特里格的邀请为契机,在改善台湾关系的条件下,中国成功地加盟了 PECC。加盟 PECC 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外政策成功转型的结果,同时,也加快了中国参与地区事务的进程,使得中国在1991年加盟 APEC 时没有遇到任何的问题。利用 APEC 的平台,1990年代,中国以经济大国化为背景积极开展了地区主义外交,稳步提高着国际地位。

### [参 考 文 献]

- [1]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 [2] ZHAGN BAIJIA. Chinese Politics and Asia - Pacific Policy [M] // EZRA F VOGEL, MING YUAN, AKIHIKO TAN- AKA ed. The Golden Age of the U. S. - China - Japan Triangle 1972-1989.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2.
- [3] 杨成绪. 中国与太平洋经济合作 25 年[M] // 梅平. 中国与太平洋经济合作: PECC25 年的历程与探索.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 [4] LAWRENCE T WOODS. Asia - Pacific Diplomacy: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93.
- [5] AKIRA CHIBA. Pacific Co - operation and China [J]. The Pacific Review 1989 2(1).
- [6] TAKASHI TERADA. Creating an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mmunity: The Roles of Australia and Japan in Regional Institution - building [M].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

- sity, 1999.
- [7] 環太平洋連帯構想研究グループ. 環太平洋連帯の構想 [M]. 東京: 大蔵省印刷局, 1980.
- [8] 渡邊昭夫. アジア太平洋連帯構想 [M]. 東京: NTT 出版 2005.
- [9] ROBERT F. DERNBERGER.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 Pacific Region and the Role of the P. R. C. [J].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1988 7(1).
- [10] 刘万镇. 日本关于“环太平洋共同体”的设想 [J]. 世界知识, 1979(22).
- [11] 陈峰. 论日本的“太平洋经济圈构想” [J]. 世界经济, 1980(7).
- [12] 宦乡. 纵横世界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5.
- [13] 罗元铮. 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增长同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 [J]. 世界经济, 1984(10).
- [14] 太平洋地区发展前景和中国现代化学术讨论会组织委员会. 太平洋地区发展前景和中国现代化 [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5.
- [15] 章粟. 太平洋地区经济合作与我国的对外开放 [J]. 亚太经济, 1986(1).
- [16] 童大林. 进入太平洋经济时代: 1984年元月29日在中国未来研究会春节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 [J]. 未来和发展, 1984(1).
- [17] 宦乡. 宦乡文集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 [18] 柳卫玉. “太平洋地区的发展前景与中国的四化”讨论会简介 [J]. 世界经济研究, 1985(1).
- [19] 赵紫阳总理致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国际贸易博览会的祝辞 [Z].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1985(32).
- [20]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改革开放十四年记事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
- [21] 益尾知佐子. 中国における毛沢東外交の再検討, 1979年—1981年「独立自主の对外政策」に向けて [J]. アジア経済 49(4) 2008.
- [22] 田中明彦. 日中関係 1945 - 1990 [M]. 東京: 東京大学出版会, 1991.
- [23] DICK WILSON. The Pacific Basin is Coming Together [J]. Asia Pacific Community, 1985(30).
- [24] 黄华. 亲历与见闻: 黄华回忆录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
- [25] 宮城大蔵. 戦後アジア秩序の模索と日本「海のアジア」の戦後史 1957 - 1966 [M]. 東京: 創文社, 2004.
- [26] 发扬万隆精神: 吴学谦外长答本报记者问 [J]. 瞭望, 1985(16).
- [27] LAWRENCE T WOODS. Delicate Diplomatic Debuts: Chinese and Soviet Participation in the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nference [J]. Pacific Affairs, 1990(63).
- [28] 川島真、清水麗、松田康博、楊永明. 日台関係史 1945 - 1980 [M]. 東京: 東京大学出版会, 2009.
- [29] SCOTT L KASTNER. 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Beyond [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30] ALASTAIR IAIN JOHNSON, ROBERT S ROS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M].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 [31] 孙岩. 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 [32] MARGRET M PEARSON.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Regime [M] // ELIZABETH ECONOMY, MICHEL OKSENBERG. China Joins the world: Progres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 [33] 宦乡. 宦乡集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责任编辑 何菊玲]

## China's Admission in PECC and Her Changes in Diplomatic Policy (1978—1986)

TIAN Kai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Liaoning)

**Abstract:** The Asian-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shortened as the PECC, is a quasi-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consisting of representatives from governments, and business and academic worlds. In 1986, China was successfully admitted into the PECC, which initially started a cooperative mechanism in the region by involving the three Asian-Pacific powers, China, Japan and America. The whole process of admission wa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and autonomous diplomatic policy, which resulted from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diplomatic policy.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China's independent and autonomous diplomatic policy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door policy, changes happened to China's relationship with the Asian-Pacific nations, including Taiwan, the improvement of which was the primary reason for China's admission to the PECC. This brought about not only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diplomatic policy but also the intensification of this policy, which helped to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China's Asian-Pacific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Key Words:** PECC; diplomatic policy; China's diplomacy; Asian-Pacificism; Olympic means; an independent and autonomous diplomatic policy